

《暴风雨》——莎士比亚后殖民解读的一个个案

华泉坤 张 浩

(安徽大学 外语学院, 安徽 合肥 230039; 合肥工业大学 人文学院, 安徽 合肥 230009)

摘 要:本文着力从后殖民的角度,重新探讨莎士比亚最后一部伟大浪漫传奇剧《暴风雨》的现实文本意义。围绕种族、性别、他者等后殖民关键词,就剧中故事发生地的历史依据所体现的殖民主义象征意义、剧中代表人物蕴涵的殖民话语中东方主义思维方式、被歪曲表征的被殖民者形象、后殖民语境下被殖民者的悲哀四个层面探讨《暴风雨》的殖民主义主题。揭示了普洛斯彼罗代表的西方传统人文主义虚伪的一面,指出它在殖民时代所蕴涵的殖民者的霸权本质,透视了凯利班象征的被压抑的被扭曲的“东方世界”的文化起因。

关键词:《暴风雨》;性别;种族;他者;东方主义

中图分类号:I10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019(2004)05-0046-07

引 言

我国莎士比亚剧作翻译大师梁实秋在他为《暴风雨》所作的序言中说:“我们不必把《暴风雨》当作‘比喻’,我们越想深求它的意义反倒越容易陷入附会的臆说。”^{[1](P8)}他否认对于《暴风雨》任何象征性的解读,否认普洛斯彼罗、米兰达、凯利班的象征意义。如果我们真是如其所言忽视《暴风雨》中由其剧中人物的种族差异和性别差异所蕴涵的殖民主义的历史性主题,我们就不能真正领悟本·琼生把莎士比亚的剧作称为“时代灵魂”(soul of the age),^{[2](P176)}从而“不属于一个时代而属于所有的世纪”。^{[2](P176)}这样略带几分神秘色彩却极富科学性的预言符合沙翁“与时俱进”(grown with this growing age)^{[3](P67)}伟大戏剧品格的真谛。特别是在后殖民主义理论思潮成为我们超越后现代主义的有力武器,在当今多元共生、多方对话的全球性理论思潮的语境下,从后殖民的角度探索《暴风雨》中殖民主义主题对于我们重新认识《暴风雨》的研究价值、文学价值,更全面认识它的历史意义都是大有裨益的。

一、殖民主题的历史探源

朱刚教授曾经对殖民主义下过这样的定义:“与帝国主义直接由一个社会通过领土扩张占领或政治、经济控制另一个社会实现统治不同,殖民主义意味着通过海外移民和军事征服这些更为直接方式实现统治。”^{[4](P284)}若从后殖民主义关注的焦点出发,凯利班对于普洛斯彼罗的反抗显然是第三或第四世界人民对于殖民入侵和殖民文化的抗争,事实上被殖民国家的文化精神生活正是时刻处于民族文化和以基督教为主导的西方帝国主义文化的张力状态中的。

收稿日期:2003-07-05

作者简介:华泉坤(1944~)男,江苏无锡人,安徽大学教授;张浩(1979~),男,安徽阜阳人,合肥工业大学人文学院教师。

首先,从历史的角度看剧中人物的种族、故事发生地的地理关系的话,普洛斯彼罗与凯利班之间本质上存在一种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的关系。整个故事发生的中心场景是在原属凯利班所有的极富象征意义的一座海岛上,对于在自己本土政治斗争中失意而被迫放逐的普洛斯彼罗来说,海岛象征着一片有待自己拓荒的处女地。莎士比亚在创作此剧时,第一批英国清教徒刚刚踏上美洲不久,而设在伦敦的资本主义海外殖民公司正在为海外移民做宣传。正如对于第一批踏上美洲的英国清教徒来说,大洋的彼岸是他们幻想中的伊甸园,“美丽的新世界”。据 William Strachey 的《海岸纪要》(*True Repertory of the Wracke*)记载,北美佛吉尼亚的早期殖民者在百慕大曾遭遇了一次海难,而且船上的船员在船只搁浅以后在百慕大岛上的遭遇与《暴风雨》中描述的状况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莎士比亚在创作《暴风雨》之前很有可能阅读了当时还没有公开发行的《海岸纪要》的原稿。因此剧中的海岛由于以真实史实为依托便具有了海外殖民地的象征意义。一如柏拉图的《新大西岛》或摩尔的《乌托邦》,莎士比亚的远离尘嚣的孤岛似乎若有若无,既虚无缥缈又似曾相识,有着浪漫传奇剧的基本因子。从叙述的层面看,故事的背景应该发生在地中海的某座岛上,但是我们仍然不难从剧中发现新世界的影子,如艾丽尔曾遵普洛斯彼罗的命令取露于百慕大群岛。此外,《暴风雨》中凯利班(Caliban)的名字既可视作是莎士比亚运用颠倒英语中野人 Cannibal 字母顺序(anagram)而构成的;另外,它的词源为吉普塞语 Cauliban,意思是黑色;而且,凯利班所崇拜的神 Setebos,据里查德·伊登的关于 Magellan 环球航海的记录,是南非土著居民信奉的宗教偶像。根据剧本,凯利班的母亲是被迫从非洲流放到这座岛上的,而当时她又怀有凯利班,显然凯利班应该是一个非洲人,而西方殖民者向来有把非洲黑人当作奴隶贩卖役使的传统。可见,莎士比亚有意无意的是把凯利班当作殖民对象和受奴役的有色人种的典型来刻画的。凯利班也极有可能是生活在加勒比海地区的“野蛮人”——在罗马教皇令止美洲印地安奴隶制前26年,西班牙王室的法令把任何对欧洲人怀有敌意的印地安人界定为粗野、生食人肉的加勒比人。从历史上看,欧洲人往往把加勒比人与食人肉者及其凶残行为和鬼怪相貌相提并论。因此莎士比亚《暴风雨》的诞生,并非完全如英国著名浪漫主义诗人、莎士比亚评论家柯尔律治(S.T. Coleridge)评论《暴风雨》时所说:“是一部纯粹的浪漫剧的范本,它的兴趣不是历史的,也不在于描写的逼真或事件的自然联系,而是想象力的产物,仅以诗人所认可或假设的要素的联合为依据。”^[5](P529)

二、解读东方主义

在《暴风雨》中普洛斯彼罗的东方主义是我们对《暴风雨》后殖民主义解读的重要对象。普洛斯彼罗在被逐米兰,失去在欧洲大陆上的公国后,被流放到一个极具殖民象征意味的海岛上去了。普洛斯彼罗登陆原属凯利班的小岛后,在统治凯利班的过程中自始至终无意识地流露出欧洲殖民者东方主义的殖民心态和思维方式。关于“东方主义”的界定,根据后殖民理论家赛义德《东方主义》的论述,它的三个所指分别是:一种学术研究科学,一种思维方式,一种权力话语方式。^[6](P3)众所周知,文艺复兴以来,西方高举人文主义大旗,而莎士比亚也成了英语文学中提倡人文主义的经典作家,无论是在其爱情悲剧如《罗密欧与朱丽叶》还是爱情喜剧如《皆大欢喜》中,他都在颂扬尘世欢乐与幸福,赞美爱情是人的最高尚的感情这些人文主义的基本理念。同时,人文主义者反对神主宰一切的观念,宣言人是万物之本的思想,主张在进行自然研究的同时,也应当加强对人的研究。在《暴风雨》中普洛斯彼罗由于早

年钻研魔法，他自诩：“普洛斯比罗也是最出名的公爵，威名远播，在学问艺术上更是一时无双。我因为专心研究，便把政治放到我弟弟的肩上，对于自己的国事不闻不问，只管沉溺在魔法的研究中。我这样遗弃了俗务，在幽居生活中修养我的德性；除了生活过于孤寂之外，我这门学问真可说胜过世上所称道的一切事业。”^{[7](P19)}人文主义者的重视研究，主张探索自然，研究科学，崇尚理性、智慧和从经验得来的知识，根据这层含义我们不难发现普洛斯彼罗其实是在自我标榜为人文主义者。普洛斯彼罗真如他自己标榜的那样是一个人文主义者吗？他所修炼的魔法一定意义上使他成为了神，而他又来自传统上笃信基督教的欧洲大陆，当他与代表异质文化的凯利班相遭遇时，他无疑成了基督教中上帝的化身。普洛斯彼罗的魔法实际上象征着殖民者对海外殖民地的军事管制，同时普洛斯彼罗在《暴风雨》中的神奇威力和支配他人按照他的个人意志发展的情节，显示出基督教中对于无所不能的耶和华的暗指，以基督教为精神支柱的正是西方文明中那些传统上笃信东方主义的欧洲。而普洛斯彼罗所掌握的白色魔法也沦为殖民者推行殖民统治规训的工具。东方主义者认识的人文主义精神，既有学者们正确的一面，也有殖民者推行殖民统治的作用。

普洛斯彼罗对有色人种的歧视暗合着东方主义的创始人雷纳以印欧人种为标准说明闪米特人的低劣，埃及人就属于这种天生的愚昧民族的论调。凯利班的母亲西考拉克斯来自非洲阿尔及尔，那正是东方主义者认为有必要对其进行改造的地区。从普洛斯彼罗对凯利班的蔑称当中即可见一斑，普洛斯彼罗把他叱为“蠢物”并居高临下地说道：“现在被我收留着做苦役。”^{[7](P35)}普洛斯彼罗恶毒地诅咒凯利班为：“妖妇的贱种”，对他曾经恶狠狠的命令道：“你这恶毒的奴才，魔鬼和你那万恶的老娘合生下来的，给我滚出来吧！”^{[7](P37)}普洛斯彼罗在海岛上对精灵爱丽尔和原住民凯利班的奴役，使其自诩的人文主义的面具充分暴露出虚伪性。事实上，正如萨特为范农《地球上的不幸者》作的前言中所说：“自由、平等、博爱、爱、……使你们上当受骗了……骂人家是肮脏的黑鬼、龌龊的犹太人和污秽的阿拉伯人……欧洲人始终只是通过创造出奴隶和凶残的怪物才能使自己成为人的。”^{[8](P558)}因此他号召人们撕开欧洲人道主义的假面具，反思殖民统治者给人类带来的罪恶。普洛斯彼罗殖民者的权威和傲慢在这个与外界隔离的小岛上得到充分的展现。精灵爱丽尔第一次登场就以被奴役者的口吻向他请安：“万福，尊贵的主人！威严的主人，万福！我来听候你的旨意……凡是你有力的吩咐，爱丽尔愿意用全副的精神奉行。”^{[7](P27)}值得注意的是，普洛斯彼罗几乎采用了类似其政治对手和篡位的弟弟一样的手腕从凯利班那里夺取了控制新世界的权力。凯利班对于普洛斯彼罗最初到来的描述清晰地向我们刻画出殖民者当初伪善的面孔和狡猾的本性。“你刚来的时候，抚拍我，待我好，给我有浆果的水喝，教给我天上亮着的大的光叫什么名字……因此我以为你是个好人，把这岛上的一切富源都指点给你知道……本来我可以自称为王，现在却要作你的臣民。”^{[7](P39)}如凯利班所言：“我屈服在一个暴君、一个巫师的手下，他用诡计把这岛从我手里夺了去。”^{[7](P107)}无意中应和了普洛斯彼罗对于其弟安东尼奥的指责：“我给与他无限大的信任，得到的酬报只是他的同样无限大的欺诈。”^{[7](P19)}然而，在一定意义上普洛斯彼罗和他的白人反叛者一样，在海外殖民过程中他们对于异质文化与土著民族的态度在本质上完全契合。普洛斯彼罗由于个人对于魔术的痴迷而导致权力的丧失，普洛斯彼罗的放逐源于权力忽视，但当他一踏进海外殖民地新世界，他便同样的染上了对征服的欲望渴求，对霸权威权的迷恋，直至最后醒悟，感叹人生如梦。这足以说明他与颠覆他的政权的篡位者实乃一丘之貉。

萨义德在《东方学》中指出：“东方”并非一种自然的存在，它不仅仅存在于自然之中。^{[6](P6)}西方与东方之间存在着一种权力关系，支配关系，霸权关系，是欧洲最常出现的他者(the Other)形象，是欧洲物质文明与文化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是强势者对弱势者的符号编码，体现了文化霸权或欧洲中心主义。欧洲殖民者认为这些民族的觉醒和文明的发展离不开他们的殖民教化和他们对于知识的传播，而这种知识实质上是其传播者意识形态的成型化、系统化、结构化。普洛斯彼罗的对于凯利班的偏见源于传统西方文明的自我优越感。东方主义者对于异己另类(other)的土著民族和原生文化根本上有一种使之永恒定格于静止的种族差异之中的认知模式，他们对于以欧洲为中心的表真(authenticity)的要求因此也成为一种确保在他们心目中对于非欧洲、北美民族一贯存在的认识不被打破，迫使当地的土著民族也放弃对自己本民族与文明进步及文化现代性失之交臂的深沉动因的探索和揭示，并且不去质疑这些基于宗主国利益和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虚拟的(imaginary)出于意识形态需要的假设，从而顺利地完成了他们对于历史重写的任务。赛义德指出：“过去存在着——现在也存在着——一种位于东方的文化和国度，它们的生命、历史和风俗具有一种严酷的真实性，而这种真实性明显要高于西方对它们所能述说的一切。”^{[9](P133)}普洛斯彼罗在对于凯利班的态度上，充分说明在他眼里，世界的中心是白种人和欧洲。白种人，在其向外扩张、征服有色人种的过程中，感受到他们的肤色在人类大部分居住区享有特殊地位和高贵权利。这种欧洲中心主义的话语的“自明的”和“常识的”知识拥有隐蔽权力的特权，而这种权力所产生的恰恰是控制性工具，即通过积极生产权力来实行控制。包括普洛斯彼罗在内的欧洲人都利用知识和真理的生产模式来行使“话语”权力。凯利班对于普洛斯彼罗的命令必须服从。从普洛斯彼罗对自己不理朝政，潜心魔术可见他天生的自我优越感。普洛斯彼罗将知识运用于两个方面：报复他的私敌，奴役土著人被殖民者。

三、被歪曲表征的被殖民者形象

西方殖民者总是想法设法地把“东方”“东方化”、“妖魔化”，尤其是在语言、道德行为方面，这实际上隐含着东方学的前提：因为你是东方人，所以你是低人一等的。所以萨义德指出：“东方学的现实是反人性的。”^{[6](P54)}在东方学这样的话语下，东方也就成了欧洲文本中的东方，它是“一个封闭的领域，欧洲的一个戏剧舞台”。^{[6](P80)}而在此欧洲人营造出来的东方舞台深处有一巨大的文化宝库，其中的每样东西都使人联想到一个寓言一样丰富的世界：斯芬克斯、伊甸园……；而舞台的布景一半是想象的，一半是已知的：怪物、魔鬼、恐惧和欲望。所以，这个东方形象的宝库是和神秘、愚昧、腐朽、纵欲、罪恶等本性联系在一起的。

凯利班的丑怪外型正是“欧洲大西洋话语权利关系”对东方世界歪曲表征的象征。它的目的是通过重塑“东方人在欧洲西方体验里的特殊位置”来界定“它(欧洲或西方)相反的形象，观念，人格，经验”，反过来以欧洲为中心的宏大叙事又是以东方主义为基础的。“有大量的作家，其中包括诗人、小说家、哲学家、政治理论家、经济学家以及帝国的行政官员，接受了这一东方/西方的区分，并将其作为建构与东方、东方的人民、习俗、‘心性’(mind)和命运有关的理论、诗歌、小说、社会分析和政治论说的出发点。”^{[6](P4)}如18世纪30年代一些西方学者研究所谓中国人的“圆锥性”(conic)大脑，认为这种大脑很难达到理性阶段，所以中国人和南美土著人种(Patagonians)、西南非洲土著人种(Hottentots)及美洲印第安人一样，统属“怪人”、“下等人”(homonstrosus)，以和西方文明为代表的“智人”(homo sapiens)相区别。^{[10](P3-4)}

在《暴风雨》中凯利班象征的印第安人和黑人，向来是白人学者竭尽全力贬低和恶意丑化的种族和肤色。于是他们根据达尔文的学说认为，黑人是同人类完全不同的，介于猿、大猩猩和人类之间的并具有同人类极其相似的特征的动物。于是凯利班只能被人们看成是人兽两性的混合物，这就构成了他成为达尔文学说中猿与人之间的过渡性生物(the missing link)的潜质。1795年，著名德国生物学家、解剖学家和人类学的鼻祖约翰·弗·布卢门巴赫提出所谓“大生物链”(The Great Chain of Being)理论，在这一理论中，他把黑人放在了仅比猿稍高一点的位置，而盎格鲁-撒克逊为主的白人放在了整个生物链的顶层。他认为，“白色”所具有的优越性和“黑色”所具有的低劣性都是固定不变的(fixed)和永恒的(stable)。^{[11](P254)}普洛斯彼罗对待凯利班的态度无疑验证了塞义德的东方主义中暴露的殖民者的殖民心态，首先他们认为西方中心以外的民族有着天生的劣根性。普洛斯彼罗把凯利班最终描述为：“一个魔鬼，一个天生的魔鬼，教养也改不过他的天性来；在他身上我一切好心的努力全然白费。”^{[7](P141)}西方殖民者对于殖民地土著民族的兴趣仅仅是源于他们想象中的伊甸园的美好憧憬，一方面在利用其纯真和高尚掠夺他们的资源占有他们领土的同时，另一方面把他们列为新加南中邪恶的野蛮人有待西方文明的教化和他们的殖民统治和“保护”。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只是把当地土著居民作为满足他们对于新世界冒险见闻消遣猎奇的对象而非真正意义上的人。文艺复兴时期的人对于新世界的“野蛮人”的态度佐证了东方主义的历史悠久。普洛斯彼罗恶毒的称呼凯利班，连善良、纯真的米兰达由于受其父的影响也把其视为非人。特林鸠罗第一次遇见凯利班时把蜷身退避普洛斯彼罗精灵攻击的凯利班当成一条鱼，说：“他的气味像一条鱼，有些隔宿发霉的鱼腥气，不是新腌的鱼。”^{[7](P85)}殖民者显然把他们自己视为世界的中心，他们征服海洋，开拓边疆，自然不愿看到类似自己形态的人，下意识首先把他们当作异类，而非同类。特林鸠罗继而又颇为得意地显示着他弄臣幽默的天赋：“要是我我现在在英国，只要把这条鱼画出来，挂在帐篷外面，包管那边无论哪一个节日里没事做的傻瓜都会掏出整块的银洋来瞧一瞧；在那边随便什么希奇古怪的畜生都可以让你发一笔财。”^{[7](P85)}他接着这样描述英国人的猎奇心态：“他们不愿意丢一个铜子给跛脚的叫化，却愿意拿出一角钱来看一个死了的印地安红种人。他像人一样生着腿呢！”^{[7](P85)}安东尼奥这个象征欧洲人类文明的堕落者对凯利班也抱有偏见，他在回答凯利班是什么东西，是否可以用钱买时特别指出：“他们中间的一个完全是一条鱼，而且一定很可以卖几个钱。”^{[7](P53)}普洛斯彼罗继而又把凯利班称为：“奇丑的恶汉……魔鬼生下来的杂种。”^{[7](P169)}凯利班对此的反映向我们揭示了殖民者的伪善残忍的真实面孔：“我免不了要被拧得死去活来。”^{[7](P169)}由此可见以白人为权力话语中心的东方主义不是一种个人的行为，它几乎成为西方人政治无意识的集体行为。东方主义的这种话语表层下蕴涵着强权即真理的命题。权力，真理，以及意识形态之间的转换关系，在欧洲人对于凯利班是一个鱼的这个断语下展开。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对于殖民地人民的歪曲表征，在凯利班进化人或非人的、亚人(subhuman)的争论中，愈发分明，总之凯利班是不能和他们相提并论的同类，凯利班只是满足他们猎奇心理的杂耍表演的对象。

四、后殖民语境下被殖民者的悲哀

凯利班最后的认罪，表明殖民主义“认知暴力”(Epistemic violence)^{[12](P36-37)}观念的最终胜利，它也是普洛斯彼罗知识霸权的胜利；凯利班的认罪同时也表明殖民者的教化达到了它

的目的,即让被殖民者最终丧失自己的文化特性意识,从而对殖民者母国的“文化产生认同”。^{[13](P6)}在殖民霸权的绝对权力下,“属下”变成了沉默和喑哑的“他者”。普洛斯彼罗正是运用了认知暴力巩固了帝国主义“君上的自我”(Sovereign Self),^{[12](P36-37)}诱导凯利班这个土著居民在自我主体的建构中与之共谋(Complicit),^{[12](P36-37)}将自身变成一个“无声的他者”。^{[12\ 1](P36-37)}普洛斯彼罗在剧末对凯利班叱责道:“他的行为跟他的形状同样都是天生的下劣。——狗才,到我的洞里去;把你的同伴们也带了进去。要是你希望我饶恕的话,把里面打扫得干净点儿。”^{[7](P171)}而凯利班却完全丧失了剧中的斗志,卑躬屈膝道:“是,是,我就去。从此以后我要聪明一些,学学讨好的法子。我真是一头比六头蠢驴合起来还蠢的蠢货!竟会把这种醉汉当作神明,向这种蠢材叩头膜拜!”^{[7](P171)}凯利班在普洛斯彼罗眼里在《暴风雨》中的大多数情况下都被视为“贱民”,普洛斯彼罗佩带着人文主义者的高大形象是在把凯利班置于“野兽”般的“他者”位置上建构起来的。凯利班的种种野蛮无礼的言行包括普洛斯彼罗对他“强暴未遂”的指控,都是凯利班将“自我”转变成为殖民者为他虚构的“他者”,简而言之即是这样的心态:既然你把我当成野人或非人,那么我就以你理想中的野人或非人的标准作为行为规范。也就是说凯利班的所谓种种顽劣和不轨行为都是以普洛斯彼罗为代表的殖民主义者或者说殖民文化主体从自身需要出发强加给被殖民者的使命,这样,普洛斯彼罗的人文主义者的高大形象才能树立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讲,莎士比亚笔下的凯利班是根据殖民主义原则制造出来的形象。殖民的本质正如思想家勒罗伊·波叶什指出的:“殖民就是一个民族的扩张力;它的繁殖力;它在空间上的扩张和激增;就是将宇宙或宇宙的一部分完全纳入这一民族的语言、习俗、观念和法律之中。”^{[6](P279)}可见殖民者的本性在于把自己的意识形态强加于被殖民者的精神世界里,从而使其彻底失去民族主体意识,变成无根的人。如此,从而完成宗主国或第一世界为建构自身,把殖民地居民变成无声的、属下的“他者”的历史重写,把殖民地变成前宗主国表达自己无意识欲望的一种标签。

凯利班在普洛斯彼罗的规训和惩戒下,放弃了对自己自我属性(identity)^{[14](P408)}的认识即曾经以为的“本来我可以自己做自己的王”。^{[7](P39)}此时,凯利班的自我的“属性”,就是对自己与“他者”——普洛斯彼罗而言差异的界定。凯利班已丧失了自己的声音,由于不断的处于被普洛斯彼罗及其权力主宰下的“他者”的地位,凯利班最终变为无声的“属下”,^{[12](P36-37)}成为后殖民的牺牲品。普洛斯彼罗的这种规劝权力是一种灵魂技术,它能够将服务于自己的观念和思想通过反复的强化使被监视者最终认同,并深入其心,从而让规训对象产生惯性的思维定势:土著民族的种族低劣,只能在权力话语中处于从属的地位。种族劣根意识因此可以深深扎根于黑人的意识中,使其丧失自我肯定行动的自由选择,沦为沉寂无声的大众。

结 语

综上所述,我们在性别、种族、权力、“东方”与“西方”的关系等后殖民概念层面上,就剧中故事发生地的历史依据所体现的殖民主义象征意义、剧中代表人物蕴涵的殖民话语中东方主义的思维方式、被扭曲的被殖民者形象、后殖民语境下被殖民者的悲哀四个层面揭示《暴风雨》的殖民主义主题,重新解读了《暴风雨》。通过对《暴风雨》的后殖民解读,我们不难发现莎士比亚作为一位超越世纪的文学大师在他的伟大浪漫传奇剧《暴风雨》中对于资本主义的海外殖民活动做了深刻的反思,揭穿了普洛斯彼罗为首的西方殖民者人文主义的虚伪

面具；同时转达了那些在殖民过程中受压抑民族的声音，向我们展示着莎士比亚戏剧“与时俱进”的伟大戏剧品格。由此可见，《暴风雨》作为莎士比亚的最后一部力作，寄托着他对人类未来命运走向的终极关怀。

参考文献：

[1] 莎士比亚·暴风雨[Z]·梁实秋译·莎士比亚全集：第1卷[Z]·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远东图书公司，2001。

[2] 本·琼生语·引自王佐良·英国文学名篇选注[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3] 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Z]·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4] 朱刚·二十世纪西方文艺批评理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5]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Zoili from The Romantics on Shakespeare ,Penguin Books, 1991.

[6] 萨义德·东方学[M]·王宇根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

[7] 莎士比亚·暴风雨[Z]·朱生豪译·北京：外文出版社，2000。

[8] 张首映·西方二十世纪文论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9] 佛克马，蚁布思·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10] Paul S. Ropp, ed. Heritage of China,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 on Chinese Civilization, Oxford: U of California 1990.

[11] Winthrop D. Jordan, White one Black : American Attitude toward the Negro, 1550—1812, New York, 1977.

[12] 拉曼·塞尔登·文学批评理论[M]·刘象愚，陈永国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13] 张京媛·后殖民理论与文化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14] 陈惇，孙景尧，谢天振·比较文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

A Post—coloni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Tempest*

HUA Quan—kun ZHANG Hao

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textual meaning of Shakespeare’s *The Tempest* from the postcolonial perspective. Centering upon such key terms of postcolonialism as race, gender, power, Orientalism, the paper lays bare the theme of colonialism in *The Tempest* at the following four planes: the historical and geographical evidence of the symbolic colonial significance of the central background of the island; the Orientalism reflected in the colonial discourse of the colonizer; the distortedly represented image of the colonized; the pathetic existence of the colonized. Through those analyses, the hypocritical mask of traditional western humanism represented by Prospero is removed to the hilt and his nature of imperialism is fully exposed.

Key words: *The Tempest* ; gender; race; the other; Orientalism

责任编辑：木 子；校对：吕海燕